

南京发现南朝‘明堂’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

贺云翱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

路 侃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3)

This paper throws light on the bricks with “Da Ming Wu Nian Ming Tang Bi” inscriptions of Song period found in Nanjing, and also tries to explain these bricks’ important academic meanings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Soul Hall” building system and six dynasties’ city arrangement.

Key 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Soul Hall’s Bricks Soul Hall

内容提要 最新披露南京新发现的南朝刘宋“大明五年明堂壁”铭文砖等一批实物资料,并阐述了这批资料对研究南朝时期都城重要礼制建筑“明堂”的建造历史及其对研究六朝都城布局的重要学术意义。

关键词 南朝明堂砖 明堂

中图分类号 K871.42

文献标识码 A

2006年5月8~9日,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及历史系的考古工作者为实施“南京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建库”科研课题,在南京市秦淮、雨花、江宁几区境内进行野外调查时,于南京老飞机场南侧一建筑堆土中发现一批南朝砖瓦及其他遗物,其中部分砖上模印有“大明五年明堂壁”等铭文,这是南京地区首次出现的与六朝都城礼制建筑直接有关的遗物,调查者当场认为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于是迅即对其来源展开调查,经走访,获知这批遗物来自市区中山南路东侧三山街“王府园”三期工程建设工地,有关人员随即又到施工现场做了调查,证实这批铭文砖和相关遗物确实出自该工地(图一、图二)。王府园三期工程工地南北长约200、东西长约150米,出土铭文砖、瓦的施工区地基掘土已经基本结束,并一直到达

了生土层,无法对出土现场再进行科学的清理发掘。因为这批铭文砖涉及到南朝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年)建造“明堂”之事,又有明确的出土位置,无疑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故现将这批材料整理发表,并就有关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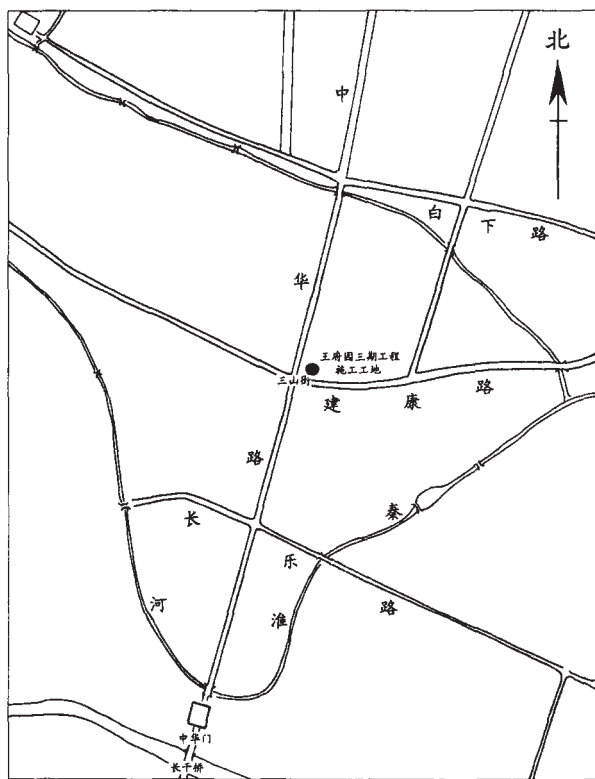
我们调查所获实物资料包括铭文砖、瓦当、筒瓦以及瓷片标本等,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一)铭文砖:数量较多,但字迹清晰者少见,共采集8件。大多为青灰质长方形砖,部分砖呈灰黄色。砖平面上皆拍印绳纹。砖之一端模印铭文。铭文有两种,一为正书,一为反书,都作楷体。以下各举一例。

1. 铭文砖 2006NSSJ采:1,长方形青灰砖,

收稿日期 2006-06-05

^{*} 本文属南京市规划局、南京市文物局资助的“南京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建库”课题成果之一。



图一// 南京三山街南朝“明堂”砖出土地点位置图
(●为“明堂”砖出土地点)

平面饰绳纹,一端面上模印“大明五年明堂壁”7字,为楷体正书。砖长34.8、宽16.8、厚4.5厘米(图三:1)。

2. 铭文砖 2006NSSJ采:7,长方形青灰砖,平面饰绳纹,一端面上模印“大明五年六月廿日”8字,为楷体反书,另一侧面上模印“大”字,亦为楷体反书。砖长31.8、宽5.5、厚4.1厘米(图三:2)。

(二)瓦当 数量较多,均残破,共采集4枚,为青灰色胎,当面模印,后加接边轮和筒瓦身。分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两种,现分别介绍如下:

1. 兽面纹瓦当 2006NSSJ采:9,局部残损,当面饰一兽面,双目斜立,水滴形眼眶,眼眶上部饰粗眉。倒梯形口,口内上下露出獠牙,口两侧有飞扬的胡须。垂胆状鼻梁,鼻梁延伸到额部,鼻梁上部两侧饰树枝状线条表示须毛。直径12、边轮宽1.3厘米(图四:1,图五:1)。

2. 兽面纹瓦当 2006NSSJ采:10,

局部残损。兽面双目作柱状凸起,细眼角,线条状眉斜立。近梯形大口,口内上下有两排牙齿,长方形高鼻梁。眼、口、鼻两侧用2道凸线条勾勒出兽面主体,兽面周围和鼻上部饰飘逸的须毛。直径14、边轮宽0.7厘米(图四:2,图五:2)。

3. 兽面纹瓦当 2006NSSJ采:11,局部残损。兽面双目斜立,椭圆形眼眶,口部残缺。垂胆状高鼻梁,鼻梁上部两侧饰树枝状线条表示须毛(图四:3,图五:3)。

4. 兽面纹瓦当 2006NSSJ采:12,边轮略残。兽面双目斜立,椭圆形眼眶。口大张,口角上部向内钩弯,上唇弯弧,口内“丫”形饰之两侧各有一颗牙齿,口、鼻之间饰卧“日”字形图案。垂胆状高鼻梁。面部周边和鼻梁上部两侧饰须毛(图四:4,图五:4)。

5. 莲花纹瓦当 2006NSSJ采:13,当面饰八瓣莲花纹,瓣尖部呈箭头形,瓣间分隔线顶端也作箭头状,使当面周边形成16个箭头指向边轮的装饰效果。中央莲房微凸,上饰7颗莲子。直径12.2、边轮宽0.9厘米(图四:5,图五:5)。

(三)筒瓦 数量较多,但皆残破。共采集3件,均残,分两种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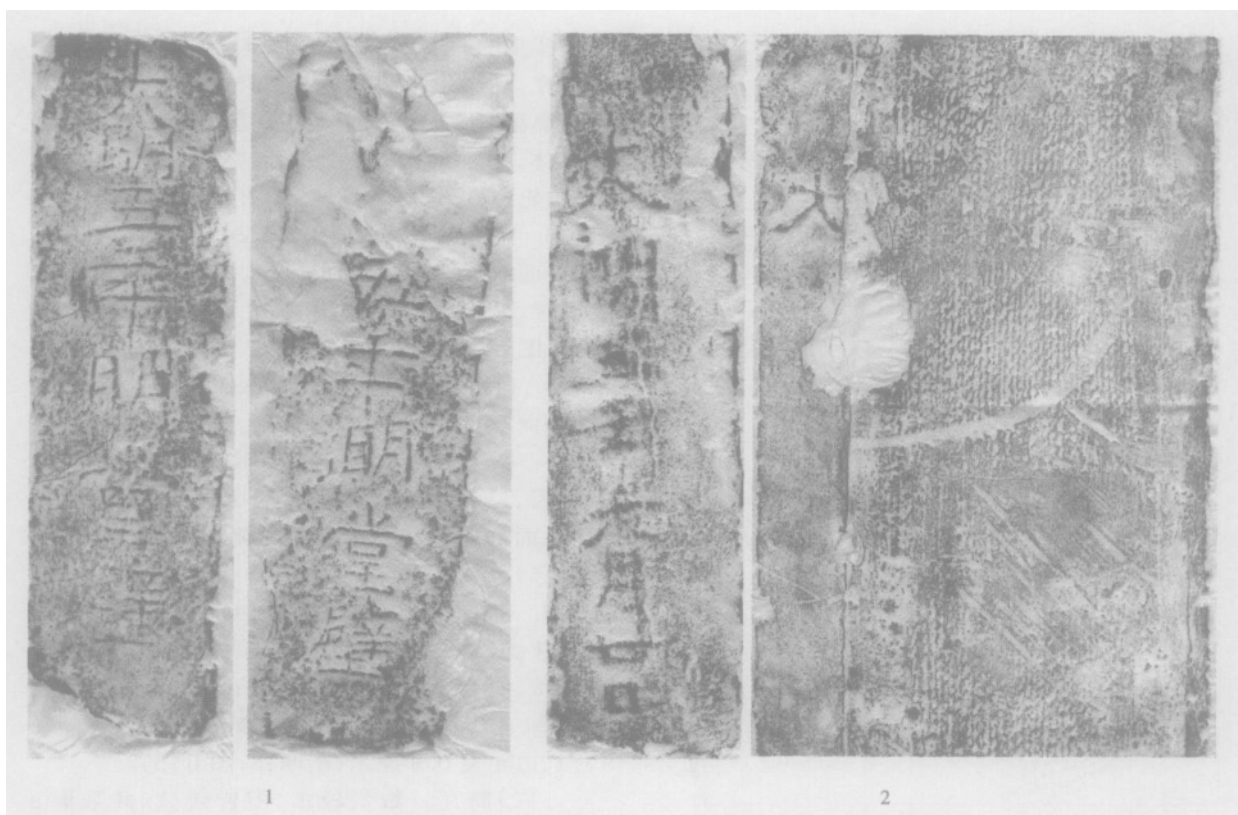
1. 筒瓦 2006NSSJ采:15,青灰质,瓦身表面光素,内面满布细麻布纹。残长24、瓦身宽14、高7.8厘米,瓦唇长4.5、宽9.8厘米(图六:1)。

2. 筒瓦 2006NSSJ采:17,青灰质,瓦身特点同上器。残长19.2、瓦身宽12、高6.7厘米,唇长3.1、宽9厘米(图六:2)。

(四)瓷器标本 共采集瓷片标本近百件,主



图二// 南京三山街王府园第三期工程施工场地



图三// 铭文砖

1.“大明五年明堂壁” 2.“大明五年六月二十日”

要器类有碗、盏、盘口壶、罐等。以下择要介绍。

1. 大碗 2006NSSJ 采 :18, 残。灰白胎, 胎质较粗, 碗壁厚, 最厚处达 1.4 厘米。实圈足, 器外刻划大莲瓣纹。器表施青黄色釉, 釉厚 1 厘米, 釉质莹润, 开细冰裂纹, 足部无釉。足部直径 12.6、足高 1 厘米, 器身残高 8.1 厘米(图六 3)。

2. 碗 2006NSSJ 采 :19, 残。烟灰胎, 大平底, 斜弧腹, 施青灰釉, 内荡釉, 外着半釉, 口部点褐彩。底径 10.8、口径 17、高 6.8 厘米(图六 4)。

3. 碗 2006NSSJ 采 :20, 残。灰白胎, 大平底, 斜弧腹, 口沿下有一道凹弦纹。施灰白釉, 内满釉, 外釉不及底, 口部一周未施釉, 为芒口。底径 10、口径 14.6、高 5.9 厘米(图六 5)。

4. 碗 2006NSSJ 采 :21, 残。烟灰胎, 大平底, 斜弧腹, 口沿下有一道凹弦纹。施青灰釉, 内满釉, 外着半釉, 口部不施釉, 为芒口。底径 9.9、口径 15、高 5.5 厘米(图六 :6)。

5. 碗 2006NSSJ 采 :24, 残。灰黄色胎, 斜弧腹, 平底内凹。施青黄色釉, 外釉不及底, 釉色亮丽。底径 6.4、口径 13.6、高 4.6 厘米(图六 :7)。

6. 盏 2006NSSJ 采 :25, 残。白灰色胎, 弧腹, 实圈足。内外满施青黄色釉, 外底有小泥丁支烧痕迹。底径 4.4、口径 8.2、高 4.4 厘米(图六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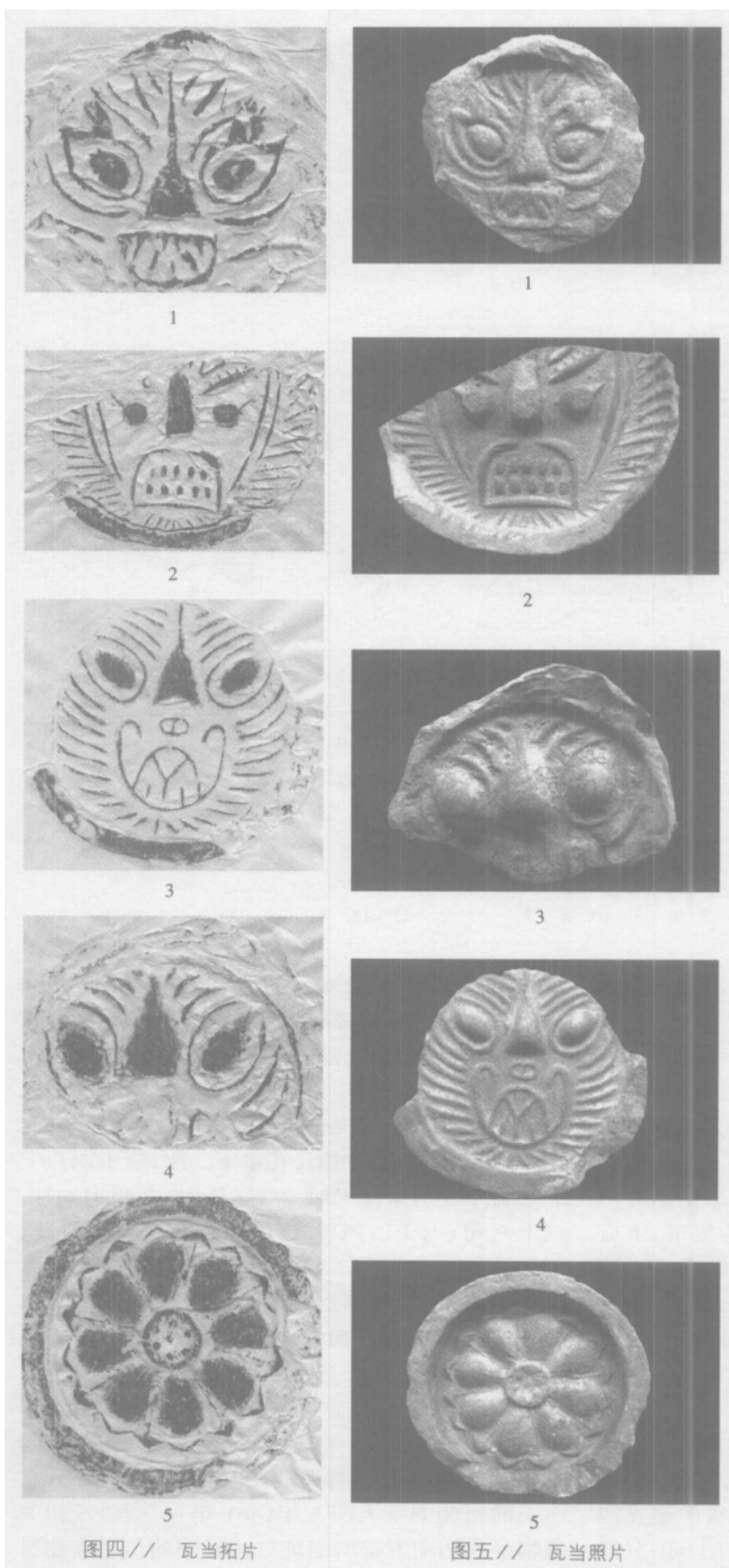
7. 盏 2006NSSJ 采 :26, 残。淡红色胎, 斜弧腹, 平底, 内外施灰白色釉, 外底无釉。底径 7、口径 10.8、高 5.6 厘米(图六 9)。

8. 盏 2006NSSJ 采 :27, 残。灰白色胎, 斜弧腹, 平底, 上腹部有一道凹弦纹。内外施青灰釉。底径 5.8、口径 9、高 2.6 厘米(图六 :10)。

9. 盘口壶 2006NSSJ 采 :28, 残存盘口及颈部。灰白胎, 颈部施一道凹弦纹和水波纹。内外施青釉, 釉色莹亮。口部直径 11、残高 8 厘米(图六 :11)。

10. 罐 2006NSSJ 采 :29, 残存口部。黄白色胎, 圆唇, 口外侈, 口下部施 2 道凹弦纹, 并竖置双桥形系。外施青釉, 釉色亮丽。口径 18.6、残高 5.9 厘米(图六 :12)。

11. 罐 2006NSSJ 采 :30, 残存口部。深紫红胎, 圆唇, 口外侈, 口下部有 2 道凹弦纹, 并横置一



图四// 瓦当拓片

图五// 瓦当照片

桥形系。施青黄釉,釉色佳(图六:13)。

12. 罐 2006NSSJ采:31,残存口部。灰胎,方唇,口较直,肩部有2道凹弦纹,并横置一银锭式系。施青釉,釉面莹亮。口径21.6、残高6.3厘米(图六:14)。

13. 罐 2006NSSJ采:32,残存口部。灰胎,方唇,口较直,口下竖置双银锭式系。施青釉。口径22、残高5厘米(图六:15)。

14. 罐 2006NSSJ采:33,残存口部。灰红胎,方唇,口较直,素面,施青釉。口径20.6、残高7厘米(图六: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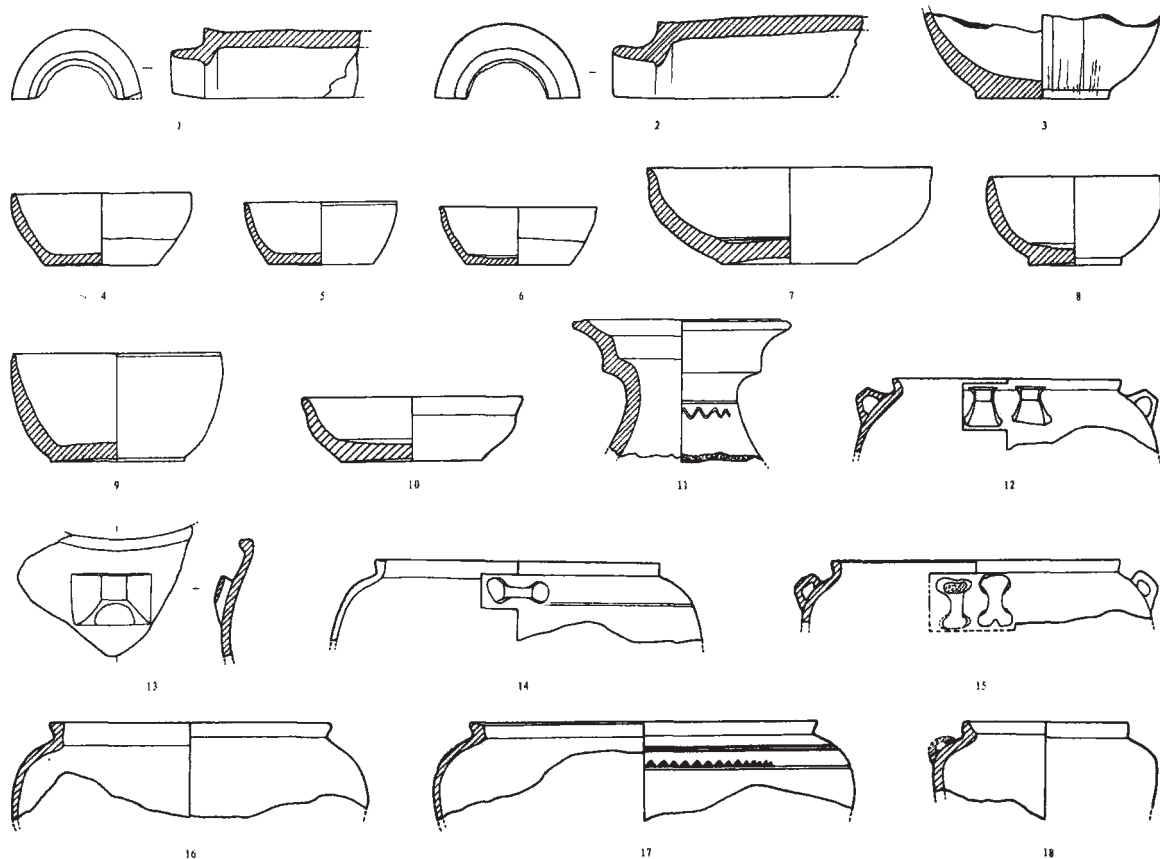
15. 罐 2006NSSJ采:34,残存口部。灰白胎,方唇,口较直,肩部施3道凹弦纹和一道由三角形纹组成的花纹带。施青釉。口径25.2、残高7.4厘米(图六:17)。

16. 罐 2006NSSJ采:35,残存口部。粗灰胎,圆唇,口外侈,肩部竖置一银锭式耳。外施黑褐色釉。口径12、残高7.3厘米(图六:18)。

二

这批出土于南京三山街的遗物,由于其中有南朝刘宋“大明五年”铭文砖,其时代应大体可确定为南朝时期。与铭文砖伴生的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在笔者过去对六朝瓦当的分期研究中,确实也具备南朝瓦当的特点^[1]。而同出的瓷器标本普遍具备东晋中后期至南朝早期的特点。因此,将这批遗物的时代定为南朝早中期是符合事实的,它们反映了南朝早期都城建康的砖、瓦当等建筑材料和生活用瓷的文化特征。

但这批遗物的学术价值还不止于此。由于这是与南朝帝王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礼制建筑“明堂”直接有关的建筑材料遗物,因此,



图六// 瓷器标本

1、2. 筒瓦 3~7. 碗 8~10. 盘 11. 盘口壶 12~18. 罐

它对研究南朝礼制建筑和都城空间布局也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张一兵先生认为“明堂制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数量不多但极其重要且难度极大的著名难题之一^[2]，因此，他专门著书予以研究。据《史记·封禅书》言：“（汉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虽然这段文字中说到“黄帝明堂图”，似乎早在中国史前时代已有“明堂”之制，但这毕竟属于传说资料，所以张一兵先生也认为，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汶上所建的这座明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准确建造日期的记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

在都城建造明堂，目前有确凿资料的是在西汉末年的王莽当政时期，《汉书·平帝纪》载：“（元

始四年夏秋）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汉长安城南郊地发现了一组礼制建筑遗存，学者们多认为这可能就是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前35年）王莽所建的明堂遗存^[4]。东汉光武帝元年（56年），光武帝于都城洛阳起建明堂，其制为“上圆下方，八窗四闰，九室十二座，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分别象征天地、八风、四时、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旬、七十二风^[5]。这座明堂建筑后经曹魏、西晋续加修建利用。该建筑遗存也已经被考古者发现^[6]。东汉人蔡邕在其所著《明堂月令》中对东汉明堂制度亦有详细的记录，近现代学者如王国维、顾颉刚、汪宁生、王世仁、刘致平、许道龄、杨鸿勋、黄展岳、黄金山、姜波等对西汉或东汉明堂都做过专门的研究。近年来，考古学者还在山西大同发现了北魏都平城时期的明堂遗址^[7]。这次南京出土的南朝刘宋大明五年（461年）明堂砖及相关遗物是我国南方都城遗址首次发现的与明堂建筑

有关的遗存,它对认识相关史料记载有着直接的帮助。

关于南京六朝都城的明堂建筑问题,姜波先生曾做过比较系统的文献史料梳理^[8]。笔者也曾对其建造过程和所在地点作过探讨^[9]。查诸文献,东吴在定都建业时未立明堂。又依《宋书·礼志》所言,东晋都城建康亦无明堂之置^[10]。明确记载六朝都城营建明堂的资料出自《宋书》卷十六《礼三》,该文献讲到刘宋孝武帝执政时期拟建明堂的时间、地点、制度等,曰“国学之南,地实丙巳,爽垲平畅,足以营建。其墙宇规范,宜拟则太庙,唯十有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彝簋,一依庙礼。班行百司,搜材简工,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缮立……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制。”^[11]文献还记载,这座明堂的建造时间是在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12]。而本次于南京三山街王府园三期工程建筑工地出土的铭文砖上的铭文恰恰也是为“大明五年”,按《宋书·礼志》载刘宋孝武帝初于大明五年四月下诏“经始明堂”,《南史·宋孝武帝本纪》讲大明五年五月开建明堂,而本次出土之砖铭则明确记录烧制明堂用砖是为当年“六月廿日”,在时间上,文献所载和考古资料前后完全衔接吻合,因此,这一出土材料充分证明《宋书》、《南史》等史书中有关南朝刘宋大明五年建造明堂的文字记录是完全可信的。《宋书·礼志》还提到,大明六年正月,孝武帝“南郊还”,“亲奉明堂,祠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13]也就是说,这座明堂从大明五年六月始建,至次年正月之前已经完工,建造时间大约6个月左右。

其次,该实物资料还为探讨南朝“明堂”的具体建造地点及六朝都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这批材料虽然不是直接在原地点经科学考古发掘和记录,但经笔者反复调查并走访工地现场,可以确认是在南京中山南路以东、建康路西端以北的三山街王府园三期工程施工现场(图一)出土,即出土地点无误。我们也曾推测,这批铭文砖材料是否有可能为后世移置于此,但经现场观察,施工现场挖掘断面上有明确的六朝地层叠压在黄沙质的生土层之上,而且出土砖、瓦数量较多,将它们看成是原先地层的遗物是符合实际的。

文献证实,刘宋大明五年所建的明堂及其基址为后来的齐、梁、陈三代所维修或利用,它的建

筑位置对认识六朝都城的中轴线所在及平面布局有直接的帮助。过去,有的学者将“明堂”的位置定在秦淮河南岸朱雀桥东南(约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东南方)^[14]。近年来,笔者依据文献资料的考证,认为南朝建康都城的“明堂”应位于宫城及都城以南的东南处(即“丙巳之地”),都城中轴线即御道以东、秦淮河北岸近岸之地^[15]。而这次发现的刘宋大明五年“明堂”砖等相关文物的出土地点又将笔者原先考定的明堂位置垂直北移了大约1000米左右,但其方位仍在笔者所考定的六朝都城御道(其南段约在今南京市中华路一线左右)之东、宫城及都城东南、秦淮河北之地,这正说明考古出土资料对弥补文献之不足具有直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学者在南京大行宫发掘出土六朝道路及相关建筑遗迹,有些学者提出六朝都城的中轴线或御道应向东移至太平南路左右一线,而此次刘宋明堂砖及其出土地点的发现对我们重新认识六朝时期的都城中轴线及御道所在可能又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此同时,由于南朝“明堂”作为都城重要的国家礼制建筑,它的位置还与太学、太庙等礼制建筑的所在发生直接关系,依笔者过去考证,太庙、太学、明堂三组建筑依次从北往南建造于都城御道以东、秦淮河北一线,而如果依这次明堂建筑遗物出土位置的发现,则这三组建筑的地点都要顺御道以东一线向北推移。那么,其中势必牵涉到对太庙、太学两组建筑相关史料的重新解释和考证,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予以专门探讨。

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考古资料,从西汉末年王莽所建的长安明堂,经东汉、曹魏、西晋洛阳的明堂,直到北魏都城平城的明堂,大体上遵循的都是较为传统的礼制,即它们的平面通常是采取“方、圆”结构^[17],但据《宋书·礼志》所载,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所建明堂却完全放弃了北方都城的明堂旧制,改用平面作长方形的太庙形制,作殿屋12间,这一制度也被此后的齐、梁、陈三朝所延用。南朝的这种新的明堂建筑制度,与业经考古发现的大约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北魏都城平城的明堂建筑制度形成了南北都城两种明堂礼制风格的强烈对比,这说明都城礼制建筑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内,甚至因为当政君臣个人不同的礼制观念而造成完全不同的建筑形式。笔者在论述前些年主持发掘的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问题时曾提出,刘宋孝武帝在位时,于礼制建设方面多有创举^[18],这次

发现的大明五年“明堂”砖正是孝武帝当政时的产物,它不仅见证了有关南朝明堂的文献记载,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文献所载孝武帝在位时期的礼制建设实践活动。此外,隋兵灭陈后,负责营建隋代新都的总设计师宇文恺曾亲自到建康废都考察,他本人对南朝“明堂”废址做了现场踏勘,并留下珍贵记录^[19],这些都因这批铭文砖的发现而获得了某种有趣的历史联系。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发现的南朝刘宋大明五年明堂砖及相关遗物毕竟不是经科学发掘的出土资料,在原出土现场的调查中,我们获知,这批遗物的出土地点已接近“建康路西端北侧,即南朝明堂建筑遗存可能一部分被压在现建康路西端路基之下及建康路西端南侧一片,我们希望在今后建康路西端附近现代建筑施工中能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以期发现尚有残存的南朝明堂建筑遗存,并弥补六朝都城考古中的这一遗憾!

(本次考古调查中还获得叶柏榆、李保平、赵瑞民等先生的大力协助,本文写作过程中,蒙万联佳同志协助整理出土遗物、周贵龙同志协助绘图、邓丽娟同仁协助拓片,在此对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 [1] 贺云翱:《南京出土六朝瓦当初探》,《东南文化》2003年第1期;《南京出土的六朝人面纹与兽面纹瓦当》,《文物》2003年第7期;《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50页。另参见王志高、贾维勇:《六朝瓦当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 [2] [3] 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3、384页。
- [4] 王世仁:《西安市西郊工地的汉代建筑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雒忠如:《西安西郊发现汉代建筑遗址》,《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61~162页等;杨鸿勋:《从遗址看西汉长安明堂(辟雍)形制》,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存与文献所载之明堂制度大体吻合。
- [5] 《通典》卷四十四《吉礼三·大享明堂》,岳麓书社1995年。另参见本文注[2]第385页。
- [6] 王仲殊:《汉魏洛阳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81~183页。

- [7] 周笑雪、张志仁:《北魏平城考古获新发现:大同清理出罕见夯土台基遗迹》,《中国文物报》1995年第37期;刘俊喜、张志中:《平城考古获得新突破:大同发现北魏明堂辟雍遗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第6期;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辟雍遗址1995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等。
- [8]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4~143页。
- [9]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0~172页。
- [10] 《宋书·礼志》讲东晋十六国时“江左不立明堂”,但《通典》卷四十四《吉礼三》讲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年)正月曾“祀明堂”,但《通典》所载目前尚属孤证。东晋时期都城建康是否建有明堂,还需更多资料予以分辨。
- [11] 《宋书》卷十六《礼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434页。
- [12] 《南史》卷二《宋本纪》中载:“(大明五年)五月,起明堂于国学南丙巳之地。”中华书局1975年,第64页。
- [13] 《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亦载大明六年春正月辛卯,孝武帝“车驾亲祠南郊(坛),是日,又亲祀明堂”,中华书局1983年,第129页。
- [14]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附梁朝建康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15] [16]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图七,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2、170~172、161~170页。
- [17] 例如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发现的西汉末年的明堂遗存,周围为圆形水沟,水沟围合的空间内中心有方形土台及方形围墙、门楼(四面各开一门)等;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发现的东汉明堂遗存平面作方形,其中部主体建筑所在为圆形台基,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发现的北魏明堂遗存周围有圆形水沟,水沟围合的空间内中部有方形夯土台基,四面各开一门等。有关资料参见本文注[4]、注[6]、注[7]。
- [18] 贺云翱执笔的《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中的注27,《文物》2003年第7期。刘宋孝武帝在位期间,在礼制建设方面有开建孔子庙,制同诸侯之礼;移南、北郊坛位;立皇后蚕宫于西郊,使六宫妃嫔修蚕桑之礼;起建明堂;初立都城南、北驰道;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于博望、梁山立双阙等等。其诸多礼制创举在南朝诸帝中甚为突出,参见《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39页;《南史》卷二《宋本纪中》,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7页。
- [19] 《隋书》卷六十八《宇文恺传》载宇文恺对已遭隋兵摧毁的南朝明堂废址考察后的收获:“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寸。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关,凡安数重。”